史话

几个经常听到却说不出所以然的文史常识

五福临门是哪五福

五福的说法,出于《尚书·洪范》。第一福是“长寿”,第二福是“富贵”,第三福是“康宁”,第四福是“好德”,第五福是“善终”。

只有五福全部拥有才是完美的,其余的各种情况都是美中不足,是有缺陷的福。在传统文化里,最重要的是第四福——好德。有着生性仁善、宽厚宁静的德,这是最好的福相。

古代中国人认为德是福的原因和根本,福是德的结果和表现,随时布施行善,广积阴德,才可以培植其他四福使之不断增长。

“三长两短”为什么指不好的事

据《礼记·檀弓上》记载,古时棺木不用钉子,人们是用皮条把棺材底与盖捆合在一起的。横的方向捆三道,纵的方向捆两道。横的方向木板长,纵的方向木板短,“三长两短”即源于此。

到后来,人们用钉子钉棺盖,既方便又快捷,三长两短的捆棺材皮条也随之消失。但是,这个词语却一直流传下来,在生活中经常使用。

“鸡丁”前面冠“宫保”

很多人知道是丁宝桢发明了宫保鸡丁这道菜,但是知道为什么被冠以“宫保”的人就不多了。

明清两代各级官员都有“虚衔”。咸丰皇帝以后,这些个虚衔多用太保、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少保来命名,所以又有了一个别称——宫保。

丁宝桢资历深、官位高,治蜀十年,为官刚正不阿,多有建树,于光绪十一年死在任上。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朝廷加封他为“太子太保”。因为丁宝桢的“太子太保”是“宫保”之一,他发明的菜也由此得名“宫保鸡丁”。

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何为“宫保”,就把“宫保鸡丁”写成了“宫爆鸡丁”或“宫煲鸡丁”。

本文原载“文史天下”微信公众号

本地特稿

自源山上铸丰碑

——记炎陵水口电站建设的艰难历程

王锡堂

当年,4000余名坚韧的炎陵开山者,以大无畏英雄气概,征战在巍巍大山中。他们一钎一锤凿壁穿石,遇沟架渡,坚持苦干了四个春秋,削平了11座山头,凿通了19个隧洞,架设了13座渡槽,建成一条用来发电灌溉的“云中天河”,把井冈山精神之旗,插在了自源大山之巅。今天,“云中天河”仍在续写昨天的故事。踏进这深山之中,到处是奋斗者的坚实足迹,深谷依然回荡着劳动者的震天号角……这里是炎陵动力之源、工业之发端,在这里可以见证创业之艰辛、人民之伟大,一切的一切,铸就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丰碑!

一锤定音

酃县(今炎陵县,下同)直至1949年还没有电,除县乡机关单位和少数富裕家庭能用煤油照明外,都靠松光、竹片、向日葵杆照明,直至1959年1月,中共酃县县委、县人民政府才在城关西郊湘山寺山脚下建成了酃县第一座小水电站,解决了当时县城部分居民的照明用电。

1973年,中共酃县县委提出了大力发展水电事业的设想。有的同志主张利用本县水利资源建一个规模较大,技术比较现代化的电站。有的同志主张在县城建个较大的变电站,把桂东沙田电站引渡过来。就在此时,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的张平化回到了酃县,语重心长地说:“酃县水力资源极其丰富,一定要充分利用,不能让他白白流走,要让它在酃县做完功以后再流出去。酃县是个贫穷山区,建个变电站,年年把钱送给人家,不如自己建个电站。”张平化的一席谈话,启迪了县委一班人,大家统一认识,决定在水口自源村建设一座装机5台、容量1.5万千瓦的高水头电站,第一期工程为装机3台、容量0.9万千瓦,总投资869万元。

水口电站建设地址,坐落于离县城30多公里的下村与水口交界的水口镇自源村,属于河漠水上游。这里峭壁耸峙水流湍急,工程十分艰巨。

1973年10月,4000民兵开赴工地。湘潭地委副书记兼酃县县委书记石维刚、县委副书记兼指挥长谌国良和5名县委常委轮流坐镇指挥。迅速在崇山峻岭之中搭起了150多个茅草棚。当时我正在县教师辅导站工作,带领全县中学数学教师到这里学习测绘,见到四周山头上搭建的茅草棚,蔚为壮观,内心为之感动。

资金短缺,县委、县政府采取挤(财政挤)、筹(部门筹)、捐、借、节(节约一切开支)、欠的办法,筹集资金375.8万元。食品匮乏,运输也成为一大难题,附近农民就像战争年代支援前线一样。纷纷加入民兵的运输行列,有的推上土车,有的担着箩筐,有的赶着牲口,还有的脱下长裤,两个裤脚一扎变成两个大口袋,装上米和菜,挂在脖子上,把所需物资送上山。其队伍就像一条长龙蜿蜒在深山之中。

“云中天河”

当年11月,电站正式动工建设。从水头大坝的筷子篓到压力前池的石耳埂渠道长8000多米,是建站的主体工程,也是整个工程最难啃的硬骨头。

建设者腰上绑条粗绳,悬空吊在悬崖,在悬崖边飞来荡去,矫健如鹰。英雄的建设者们置生死于度外,在悬崖上打炮眼,灌炸药,炸山头。1973年11月18日,电站开工第三天,突然出现一处哑炮,中村公社龙潭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陈书耀身先士卒,主动请战上前排险,不料,哑炮突然炸开,陈书耀倒在山头,鲜血染红了山岗。他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了一个共产党员“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誓言。1974年4月,他的女儿,刚二十出头的陈二桃忍着刚刚丧失父亲的悲痛,向电站工程指挥部递交报告,要求代父修渠,完成父亲未了的心愿。

崩坎窝段隧洞全长500多米,是修渠过程中难度最大、危险最大的“咽喉工程”,1974年冬的一天,几声炮响,山头上大面积石块顷刻滚滚而下,沔渡二连民兵张生才来不及隐蔽,被滚下的山石砸到了崖底丧生,此时他还不足18岁。为减少伤亡,广大民兵献计献策,采用拱涵的办法,打通一节,拱一节,逐步推进,终于攻破了这一难关。

整个工程建设所需的25000多吨物资、近百万方土石全靠民兵一副铁肩膀、一双铁脚板挑运。女子22连是湘东铁路工程的模范连,来到建站工地,便担任了采运沙石的任务,起早贪黑苦干数月,创造了人平均采运沙石0.6立方米的纪录,超额完成了指挥部规定的0.4立方米的任务。接着又向指挥部请战,参加切取石料的行列,她们不畏难,一边学一边打,双手打起了串串血泡,飞石打破了皮肤,打肿了眼睛,一个月过去,她们终于打出了好料石。

1400多个昼夜,建站大军住茅棚、睡地铺、架软梯、战险峰,与种种困难顽强拼搏,终于在1977年在直插云端的悬崖绝壁上开出了一条宽3米、深2.7米、长8170米的“云中天河”。这是酃县建设史上的奇迹,有人形容这就是湖南的“红旗渠”。

春泉喷射九重天

当时要购制一台水口电站所需规格型号的发电机也很不容易。正在燃眉之急,张平化亲自写信给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赵紫阳,请求帮助。赵紫阳当即指示:支援山区、老区建设,我们有责任,广东困难再大,也要设法解决。几经周折,韶关水轮机厂专门为酃县生产了三台3000千瓦的高水头发电机组。

1977年4月9日,一座规模较大的242米高水头电站终于在荒丘野岭上拔地而起。这天,艳阳高照,电站工地彩旗飞扬、人群浮动、呼声如雷,3台3000千瓦发电机组正式运动投产。张平化亲自为电站剪彩。看到飞泉直下的壮观景象,抑制不了内心的冲动,兴致勃勃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春泉喷射九重天,冲散乌云万万层,湍激成霄震天地,井冈星火永燎原。”

1981年,水口电站荣获水利电力部“全国小水电优秀电站”称号。

文史博览

古代凉鞋 有点“森系”

郭醒

盛夏时节,人们不仅换上了轻薄短小的衣服,让身体得到凉爽,脚上也都穿了通风透气的凉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凉鞋的样式和材料也不断翻奇出新,令人眼花缭乱。那么在古代社会,人们在夏天是否也要换上凉鞋?古代的凉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追溯一下鞋子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人类最早发明的鞋子就是“凉鞋”,有保暖功能的鞋子反而是后来出现的。

在中国古代,鞋子被称为“屦”或是“履”,制鞋材料有草、麻、皮革、丝帛等,最低级的无疑是草鞋。不论工艺如何讲究,草鞋也必然是粗疏的,它的防护功能主要体现在鞋底,不具备保暖功能,夏天穿可以看作“凉鞋”;用麻制鞋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把麻搓成绳子,然后再编成鞋,这种鞋与草鞋相似,也可以看成是“凉鞋”;另一种则是把麻纤维织成布,以麻布做鞋子的面料,与用丝帛制成的鞋相似。用麻布或丝帛制成的鞋子比较精致细密,虽然保暖性也不强,但与“凉鞋”的差距还是蛮大的。至于皮革制成的鞋子则与凉鞋毫不相干,一般在冬天才穿。

草鞋又称躧,字又作蹝、屣。脱掉草鞋是很方便的,所以古人常以“脱躧”表示事之轻易。《淮南子 主术训》:“尧举天下而传之舜,犹却行而脱躧也。”高诱注:“言其易也。”草鞋又是贱物,所以脱躧、弃躧又表示视之如粪土,有个成语“弃如敝屣”,就是这个意思。

说起凉鞋还容易让人联想到日本人生活中仍保存的木屐,原是我国古代的木屐。颜师古《急就篇注》:“屐者,以木为之,而施两齿,可以践泥。”

南北朝时士族大夫好屐,不但以为常服,而且亲自动手制作,以至成癖。《晋书阮孚传》:“初,祖约性好财,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财物,客至,屏当(遮挡)不尽,以身蔽之。有诣阮,正见自蜡屐(往屐上涂蜡),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双)屐。’于是胜负始分。”(《世说新语·雅量》)

《南史 谢灵运传》:“(灵运)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常着木屐,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则去其后齿。”后来人们便把这种屐叫谢公屐。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说“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本文原载“辽宁卫视第一时间”微信公众号

古人的森系凉鞋——草鞋。网络供图

时事·聚焦

责任编辑、美术编辑:肖星平　校对:马晴春

“蓉宝”背后的故事

——中国保护大熊猫之路

7月28日,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四川成都市开幕,以大熊猫“芝麻”为原型的成都大运会吉祥物“蓉宝”,“火出了圈”。

从1963年我国首批大熊猫保护区开始建立,到2021年正式设立横跨川、陕、甘三省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的受威胁等级也从“濒危”降为“易危”……

在大熊猫的故乡,“蓉宝”在为人们传递青春与活力的同时,也向世界“讲述”着中国保护“国宝”大熊猫的故事。

7月28日,成都大运会吉祥物“蓉宝”在开幕式上。

新华社记者 胥冰洁 摄

破解“三难”
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稳定增长

今年5月底,大熊猫“鑫鑫”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顺利诞下一只雌性幼崽。这是今年该中心圈养大熊猫产下的第一只幼崽。

目前,在卧龙神树坪基地,还有十几只待产的大熊猫妈妈,中心的繁育团队24小时轮流值班,全面监控“准妈妈”们的身体情况。

“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会被熊猫妈妈紧紧地抱在怀里。为保证大熊猫宝宝能吃上母乳,饲养师们会日夜守护,为大熊猫宝宝的成长发育保驾护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魏荣平说。

大熊猫是我国特有物种,足迹曾遍及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然而,在度过漫长而严寒的冰川期后,人类活动影响不断加大,大熊猫的栖息地逐渐缩减,一度濒临灭绝。

早在1953年,我国就开始在动物园开展大熊猫的人工饲养。然而,圈养大熊猫的发情难、配种受孕难、育幼存活难等“三难”问题难以突破。

“那时大熊猫间总是‘不来电’,它们被送进‘洞房’后总是打架。”回忆当年的情形,大熊猫专家张和民说,“我发现,大熊猫一紧张激素分泌就出问题。野生大熊猫喜欢独居,而圈养大熊猫被单独关在笼子里,彼此间没有什么感情。”

于是,张和民研究团队把大熊猫们聚在一起,让它们共同玩耍,“自由恋爱”。历经13年艰苦攻关,张和民团队辅以环境富集、行为诱导发情、创新饲料配方等技术,终于破解了“三难”密码。其后,大熊猫人工繁育技术得以长足发展,大熊猫的迁地保护体系逐渐成形。

随着大熊猫人工繁育、饲养管理和疾病防治等体系的构建,我国圈养大熊猫从最初的10只到目前的670余只,已发展为一个健康有活力、遗传结构合理的大熊猫圈养种群,基本实现了该种群的自我维持和可持续发展。

“圈养大熊猫为我国开展大熊猫系列延伸性科学研究提供了强大的资源保障,除了保存种源的功能外,也为国际交流合作、野化放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具有反哺野生种群的能力。”张和民说,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大熊猫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

野外引种、野化放归
推动大熊猫野外种群复壮

野外调查表明,由于自然隔离和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我国大熊猫野外种群被分割成33个局域种群,目前有24个局域种群因为数量少而存在生存风险。

“如果任其发展,一些很小的大熊猫种群会因近亲繁殖造成基因退化,或因遭遇自然灾害、疾病等而永远消失。”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核桃坪基地主任吴代福介绍,大熊猫野化放归、野外引种,是我国探索恢复壮大大熊猫野外种群的核心措施。

2010年,吴代福和同事们组建了一支有15名科研人员的团队,带着精心挑选的4只大熊猫,来到核桃坪基地,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大熊猫野化放归、野外引种等工作,以实现壮大野生大熊猫局域小种群的目标。

2017年11月,四川栗子坪。笼门拉开,人工繁育大熊猫“八喜”和“映雪”冲出笼子,一溜烟奔入森林,回归大自然。为了这一刻,许多人付出了极大艰辛,甚至鲜血。

2016年底,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青年研究者韦华照看的大熊猫“喜妹”在野化培养中,护崽心急,猛地扑倒了他,韦华被严重咬伤。

受伤前,韦华常在“喜妹”身边轻声呼唤,就像呼唤老友亲人。受伤后,韦华说起“喜妹”,眼里还是充满宠溺:“它只是动物,它又不懂事。”

截至目前,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已先后野化并放归“淘淘”等11只人工繁育大熊猫,另有6只雌性大熊猫参与野外引种,其中2只野外救护的大熊猫先后产下幼仔8只,存活7只。

未来,我国将加快大熊猫野化培训、放归、监测等关键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应用,力争每年实现放归大熊猫3至6只,并通过引种加大野生大熊猫濒危小种群资源保护,逐步建立野生大熊猫遗传种质资源库,实现圈养与野生种群基因双向交流。

“相信随着一代代追‘猫’人的付出,一定能够实现野生大熊猫种群的健康繁衍。”吴代福说。

大熊猫国家公园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家园

从青藏高原东缘沿着横断山脉往北,延展到秦岭,这块狭长的区域是野生大熊猫最后的原始家园。

“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在政府、科学家和国际社会等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大熊猫野外栖息地的面积和野生种群数量的下降趋势被逐渐扭转,并出现明显恢复。自2016年起,大熊猫的受威胁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也彰显了对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取得的斐然成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李晟说。

大熊猫国家公园专家委员会委员王放认为,大熊猫的保护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下一步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是缓解栖息地的破碎化和种群之间相对分散的隔离问题。

为更好保护大熊猫,我国于2017年全面启动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2021年10月12日,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地跨川、陕、甘三省,总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

位于川北的黄土梁走廊带连接平武县和九寨沟县,以往由于有盘山公路和沿路的人为活动,大熊猫长期面临“走婚难”。但自从盘山公路变成隧道,植被逐步恢复,大熊猫、羚牛等动物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山坡上。

“大熊猫国家公园在整合原有各类保护地的基础上,以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原真性、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为目标,让大熊猫更好栖息、生存和繁衍,为生态系统的长期保护提供保障。”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向可文说。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保护了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并打通了13个大熊猫区域的种群生态廊道。

大熊猫国家公园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对人为活动和开发性、生产性项目建设活动实行严格的差别化管制。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如何破解?

四川宝兴县是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被称为“熊猫老家”。近年来,当地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关停了20多座小水电,全面关停国家公园内的矿山,为大熊猫栖息繁衍营造更好的环境。现在,野生大熊猫在这里活动频繁,“村民偶遇大熊猫半夜出山”“游客拍摄野生大熊猫上树”“野生大熊猫做客村民院子”频频登上网络热搜。

“我们在一些区域开展的大熊猫DNA个体识别表明,各区域的个体数量都在增加。随着个体扩散,野生大熊猫活动范围也在扩展,这是可遇见率增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据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最新的大熊猫重点区域监测报告显示,近几年,野生大熊猫检出只数增加,同域物种遇见率增长明显。通过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区内生态保护持续向好。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唐家河片区入口处,有一个落衣沟村。当地因地制宜发展符合保护要求的特色农业和生态旅游业,让曾经“靠山吃山”的村民走上了绿色发展之路。“生态保护好了,我们的日子也好了,小鹿经常跑到我家院坝来。”57岁的杨庭秀家养了几十箱蜂,再加上经营生态“农家乐”,每年家庭收入十多万元。

“我们保护大熊猫不仅是为了保护这一个物种,更是要保护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与湿地保护处二级调研员张倩说,大熊猫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保护大熊猫恰似在自然界中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从人工繁育圈养到推动野外种群复壮,从碎片化的栖息地到整体性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受威胁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凭着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执着和坚守,中国不断探索保护大熊猫之路,为世界提供了又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功范例。

(据新华社)